

简析中国社会主义进程中政治话语模式的变迁

陈佩珊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进程中出现了巨大的社会转型,在社会转型的背后是政治话语模式的变迁。通过对国家、执政党和政府这三个层面的话语模式转变的分析,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脉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政治话语模式;变迁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1)17-0012-02

作者简介:陈佩珊(1983-),女,华侨大学(福建泉州 362021)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收稿日期:2011-06-14

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理念。所谓“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科学理论,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广大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设新社会的现实运动,就是无产阶级建立的以消灭剥削、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制度。总之,它是科学理论、现实运动和社会制度的统一体。中国的社会主义进程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过程,是科学理论、现实运动和社会制度统一体的集中体现,它是同时代主题、中国国情和实现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在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伴随着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转变,这明显地表现在政治话语模式的变迁上。话语模式是反映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关系的论述,它可以产生强大的精神力量。话语模式同实际的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它展现了一个时代的风貌,透过话语模式我们可以看出政治权力活动的方向。本文通过政治话语在国家、执政党和政府这三个层面的转变分析,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历程,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不断深化进行理论探讨。

一、国家指导思想的话语变迁

我国指导思想的话语变迁表现为:在马列基础上,从“毛泽东思想”到“科学发展观”。

首先,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当时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中国社会存在两个主要矛盾:一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二是整个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此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首要历史任务就是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毛泽东思想要解决的中国问题是: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其次,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主题

是:国家建设。当时中国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在结束文革后,逐渐认识到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此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历史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邓小平理论的主线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入21世纪,国内外都出现了新形势: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并存,世界范围的民主化浪潮涌动,一批长期执政的政党丧失执政地位。此时中国要追赶世界潮流就要加快改革开放,加快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扩大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涵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四,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发展呈现出新特征:经济实力增强,但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型模式没有得到改变;经济体制改革加快,但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但贫富差距拉大。在此时代背景下,“科学发展观”提出:第一要义是发展,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核心是以人为本,切实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坚持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

综上所述,根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中国的国家指导思想在不断地与时俱进。国家指导思想话语模式的变迁,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

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结果,是国家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国家指导思想话语模式与执政党工作中心的话语模式密切相关。

二、执政党工作中心的话语变迁:从革命到改革

首先,革命话语:以阶级斗争为纲。革命话语系统的中心词是革命,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2]因此,革命是暴力的、排他的。中国共产党在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以后,变成了执政党,但是“革命”并未随着革命成功而结束使命。由于左倾错误的扩大,阶级斗争盛行,阶级敌人泛化。在反右斗争中被错误划为“右派”的人员占到99%,在文革期间更是把“革命”话语上升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高度。这种“革命”观念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历史任务所要求的执政理念不相适应,这就需要对革命话语进行创新:首先转变革命的对象,由革“人”转变为革“物”,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其次将“改革”纳入到“革命”的范畴,扩大革命的内涵。随着革命话语退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中心舞台,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其次,调整话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调整成为1979年至1981年期间中国共产党的中心话语,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观念转变为“改革”观念的过渡话语。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开始转变政党理念,逐渐由革命型政党转向执政型政党,所以中国共产党调整了工作中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进行经济调整,调整公有和非公经济比例和结构,积极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为深化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改革话语:建设和谐社会。改革开放初期,对经济比例和结构的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要建设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调整”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进行体制改革,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将会受到阻碍。所以在80年代中后期,“改革”话语逐渐压倒了“调整”话语,并日益成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中心话语。此时的改革方向也从经济体制改革转向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范围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改革的目标是首先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从马列主义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是从革命到改革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也伴随着政府管理理念的话语模式转变。

三、政府管理理念的话语变迁:从统治到治理

首先,统治话语:全能型政府。在毛泽东时代里,革命话语是国家的中心话语。新政权的建立初期到处弥漫着斗争哲学,政府管理完全为政治统治服务,所以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政府被万能化,“利维坦”式的全能政府的权力触及到社会的每个角落,社会完全失去了自主性。

政府管理的全能主义具有“无限理性”的致命自负冲动。万能政府统治社会,在简单的政治形态中或许可行。但是,随着社会的复杂化的加深,传统的“统治”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哈耶克指出,人类的无知普遍存在,即便专家的知识也是“非常局限性的观察结果”^[3]。在实际决策过程中,由于信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人们只能想出少数几个选择,同时对可能的结果难以预测到。因此,决策者不可能具备一套完整、明确和偏好一致的行为集合,不能选择完美方案。人们只有做出满意的决策而非最优决策。然而,在全能政府的“统治”话语具有完全理性的弊病使得大量公共决策失灵,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为政府的全方位的管理得到提高。随着革命话语失去中心地位,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工作的中心,政府的管理理念也逐步由“统治”转变为“治理”,由自上而下、通过发号施令的方式对公共事务进行单一向度的管理,到上下互动、通过协商合作确立公共目标完成公共事务的管理过程。

其次,治理话语:服务型政府。当前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政府为更好地完成公共服务职责应该由“管制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积极引入新的公共管理范式:治理。

传统的政治“统治”开始出现“价值萎缩”,由于历史往往是一旦选择了政体,政治逻辑的重点是维护政府形式,而不是推动人类的发展。人类发展的核心衡量标尺是人类公共问题,而治理话语构建过程是进行价值重估:诉求公共利益,通过多元合作为发展服务。是否关心人类发展的公共性是统治和治理的差异。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化的时代中,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以治理话语在中国具有更高的合法性。治理所坚持的管理机制主要不是靠政府的权威,而是靠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运行的向度是多元互动的,而非单一的自上而下模式。合作网络的分析模式综合考虑了政府层面和非政府层面对治理的阐述,它对政府来说是由“划桨”转化为“掌舵”,对非政府而言是被动排斥转化为积极参与。治理理论实质是民主合作管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

(下转第16页)

第一,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自然条件,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满足物质享受,更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全面发展,通过生态文化的教育渗透,使人们把自身活动自觉融入与自然界的融洽相处,合理节制自己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需求,进而合理有效地促进“自然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生态文化倡导生态伦理和生态行为,号召用生态文化知识来武装群众,使广大人民群众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不断认识到生态保护和建设的重要性,唤起群众的生态意识,提高群众生态环境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激励群众积极投身生态建设中去,从而形成具有强大群众基础的生态保护力量,进而促进“自然生产力”和谐永续地发展。

第三,生态文化是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形态,强调树立生态生产观,即通过生态文化的渗透影响,使决策者对经济增长方式实施变革和转换,不只是人向自然大量索取资源来发展经济的方式,而是逐步确立以生态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观念,把依靠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生产与生态有机地结合起来,走社会经济活动与自然系统互利互惠、协调平衡的发展道路。

(四)发展低碳经济、倡导低碳生活

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3]。发展低碳经济、倡导低

碳生活对促进“自然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现代生产发展中,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我国社会生产力随社会生产发展呈现递增趋势,而自然生产力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则呈递减的趋势;当今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是以对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利用和消耗为前提的,目前我们是暂时处在物质生产表面繁荣、自然生产实际枯萎的极不协调的时代。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引导低碳社会生活方式,使人们在适度发展进程中合理消费、促进人居环境的美化和谐,进而自觉、自愿地采取合理有效措施促进自然生产力的优化发展,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第二,在低碳经济战略导向下,我们应积极出台鼓励我国企业进行低碳创新、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的政策,来引领企业实施低碳生产模式,摒弃以往先污染后治理、先低端后高端、先粗放后集约的发展模式的老路,使低碳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流,实现经济发展与自然生产力发展的共生、双赢,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总之,只有采取“多管齐下”、注重实效的多种方式促进我国当前“自然生产力”的优化发展,才能在经济转型中真正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道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跨越。

参考文献:

- [1] 廖福霖.生态生产力发展研究[J].南平师专学报,2003(4).
- [2] 王黎萍.我国生态文化的现代意义[J].甘肃农业,2007(4).
- [3] 金乐琴,刘瑞.低碳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J].经济问题探索,2009(1).

(上接第13页)

性将在政府治理话语中大大凸显,人民在治理话语中不断地实现自我管理,政府在治理话语中不断转变职能走向服务型政府。

四、结语

国家指导思想、执政党工作中心及政府管理理念的话语模式转变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从西为师”转为“以己为师”,坚持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到科学发展观,从“革命”到“改革”,从“统治”到“治理”的话语模式的转变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它是马

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过程,是政府由管制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这些话语的转变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胜利,为全国人民增强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同时,透过这些话语模式的转变我们也看到了未来的方向,坚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决心。

参考文献:

- [1] 高放.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68.
-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7.
- [3] 哈耶克.自由宪章[M].杨玉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49.